

路径与旨趣：近代浙江文化史研究嬗变¹

张凯（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近代江南史研究见证并参与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相比上海、苏南等地，浙江近代文化史研究亟须进一步拓展与深化以革命与事件、结构与认同、学人与学派等研究路径为线索，回顾浙江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关键要素，应能展望今后研究的方向：去意识形态化、突破单向度思维，以多元视角阐释近代浙江的革命群体与事件；揭示近代浙江文化现象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结构与心态、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进一步认知近代精英与民众、国家与社会的能动关系；浙江学人在近代学术流变中发挥承前启后的作用，学人学术思想的本意及其实践成为近代浙学重建的重要参考。运用整体视角综合事件、结构、学理，积极拓展史料与理论范式，深入发掘近代浙江文化的历史经验和内在脉络，将为探索中国原理提供有效的知识与思想资源。

【关键词】近代浙江文化史；嬗变；浙学；中国原理；革命与事件；结构与认同；学人与学派

文化作为观念形态，“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1]63}。20世纪80年代初期，学术界深刻认识到中国文化史综合研究的空白，不仅影响相关学科的纵深发展，更妨碍从总体上认识中华文明，难以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知识参考。此后，切实加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成为大势所趋，文化史成为显学，各类文化通史、专题史、区域史研究著作纷纷出版。滕复等学者合作撰著的《浙江文化史》“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全面而系统阐述省域地方文化史的专著，它弥补了我国区域文化史和浙江地方文化史研究的空白，具有开创性意义”^{[2]122}。该书第四编“走向近代和开放的浙江文化”叙述元明清三代浙江文化发展的历史，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与中西文化的冲撞、学术思想的兴盛与近代人文主义思潮、文学艺术及其近代导向、科学技术的进步、文化事业概况、艰难的近代化进程等方面，对近代浙江文化变迁进行了系统叙述，初步设定了浙江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对象^[3]。沈善洪先生集结浙江省内浙江文化研究专家，从思想学术，文学艺术，浙江教育，出版、藏书、新闻和方志，城市文化和景观文化，浙江民俗等六个专题梳理浙江文化的演化^[4]。此书涉及的近代部分内容可视为近代浙江文化各专题的系统综合研究。浙江地区素有编史修志的传统，各县市纷纷编纂各地文化史，参照两本《浙江文化史》，并依据地方特色而有所取舍。浙江近代文化的专题研究多在省市政府的倡导与支持下系统展开。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对整理历代浙江文献的推动作用自不待言，还有多部浙江近代文化史专题研究著作出版，梳理了近代浙江电影、文学、小说、印刷、藏书的发展历程。杭州文史研究会推动了民国杭州研究丛书的出版，内容涉及民国时期杭州的新闻、民间信仰、道教、西湖景观文化传播、文人、文学与学术、艺术教育、饮食等文化史的各个层面。温州、宁波、绍兴等地近年陆续出版地方文献丛书、通史与相关文化专题著述。此类研究梳理了浙江文化近代传承的各个面相，成为进一步深入探讨整体历史的基础。

¹ **【收稿日期】** 2015 — 07 — 21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6 — 02 — 26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CN33-6000/C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3&ZD15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浙江大学人文学部人文研究重点项目“差异性与一体化：江南区域史的研究与问题”

【作者简介】张凯（<http://orcid.org/0000-0003-3263-5804>），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近代思想史、文化史研究。

广义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涵盖社会组织、政治制度、学术思想、文化传播、生活方式等诸多历史范畴。研究范围包罗万象，研究路径必须独具慧眼：考察社会、政治、经济活动与思想观念的互动，揭示历史主体行为背后的精神内核^②。本文无力按照学科分类对既有近代浙江文化的相关研究展开全面细致的分析，仅基于研究路径与旨趣，回顾近代浙江文化史研究的关键要素，并尝试展望其今后拓展的方向。

一、革命与事件

20 世纪 50 年代的近代史分期与线索讨论中，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运动及其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阶级分析方法与群众史观在近代史研究领域得以全面贯彻。革命史叙事将革命视作历史前进的动力，以革命事件为中心建构革命系谱，用阶级分析方法探讨反帝、反封建、阶级矛盾与斗争等议题。革命事件的起源、发生、发展、成败被视为有明确因果链条的历史过程，并由此阐发革命事件的时代与现实意义^[5]。政治指向与现实关怀本是学术研究的应有之义，革命史研究的群众史观是近代学术眼光向下的产物，而浓厚意识形态与道德判断色彩反而使对历史主体的行为和精神意识的叙述形成单线条，显得脸谱化，甚至有宿命论倾向。20 世纪 90 年代的国学热和文化热无形中成为“告别革命”浪潮的有机组成，去意识形态化、突破单向度思维成为近代文化史研究的趋势，以多元视角阐释革命，革命群体与事件的文化张力得以充分凸显。新式学生群体、“秋瑾案”、五四新文化运动、共产主义运动作为近代浙江革命思潮演化和实践的关键，凝聚了各种思想冲突、国民觉醒与人的解放、知识转型与形象建构等多重文化解释。

清末浙江学堂学生和留日学生是清末社会学生群体的缩影与典型，对清末学潮、辛亥革命及民国政局等重大历史事件均有重大影响。何扬鸣认为，浙江是留日运动的发源地，浙江留日学生把民族和民主革命思想由日本引向国内，推至城乡，将整个江浙地区推进到新的“觉悟时代”；留日学生组织或参与各种革命团体，是辛亥革命的生力军^[6]。桑兵以 1902 年浔溪公学第二次风潮为例，比勘各方记载，力图回到历史现场，澄清事件来龙去脉，分析此事对参与各方后来思维行为的深远影响，揭示参与者对后来诸多重大问题态度各异的潜因^[7]。吕顺长系统研究了清末浙江留日学生群体，从杭州蚕学馆至“五校特约”计划实施，以计量方法分析留日学生的人数、生源地、学校及专业分布^[8]，并拓展至讨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及其影响^[9]。刘训华力图超越“新旧冲突”的分析视角，以清末浙江学生群体的产生、集聚、参与学潮、进入社会等为明线，以“学生—社会—国家”为暗线，分析这一新兴群体的动态行为，勾勒出清末浙江学生群体与近代中国政局演变、社会发展之间的历史互动。学生群体与政府因交流渠道不畅而导致同途异路，学生最终成为清廷的掘墓人^①。

秋瑾是近代浙江革命的先驱，秋瑾案成为革命史叙述的重要一环。“秋案”后数年的新闻舆论时起时伏，民间舆论借秋瑾案攻击浙江官府的历史实情被视为清末一次成功的舆论干预，是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里程碑。秋瑾案中民间舆论与官府作为的互动表明，预备立宪之初，立宪派与清政府之间便已貌合神离，立宪派与革命派合流可谓渊源有自^②。从文化建构的层面而言，李细珠指出，秋瑾革命家形象的建构存在诸多机缘际会，秋瑾案后的社会舆论促成女性革命家形象的初步建构；革命领导人褒扬与各类纪念活动使这一形象获得政治权威合法化保证；学术研究为此提供学理支持；各种文艺形象的塑造使秋瑾的女性革命家形象逐渐获得民众和世俗社会的广泛认同。“女性”、“半边天”的革命话语是秋瑾革命家形象建构的基石^[10]。胡纓以秋瑾为个案，聚焦于女性、殉身与现代性的交集，展现现代殉身如何拒绝、复制或重建前现代传统；并从记忆、想象和遗忘三个角度进入秋瑾的纪念史，关注纪念秋瑾的公共建筑及其背后国家权力的实践，揭示秋瑾如何变成多样的象征物，被贴上复杂甚

² ① 关于文化史的范畴，可参考李长莉《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见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4—29 页；黄向春《区域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视野与经验》，载《光明日报》2009 年 12 月 8 日，第 12 版；张仲民《新文化史与中国研究》，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1 期，第 100—108 页诸文对笔者多有启发。

至矛盾的标记^③。王楠批评学界的秋瑾研究存在过度强调“女性化”之嫌，尝试多面向地审视秋瑾身后事，力图书写新的秋瑾故事，进而表明私人记忆可以多元并存，大写的公共记忆具有单一性与匀质性特征，秋瑾在公共记忆中成为可资利用与攀附的政治符号^[11]。

浙江是全国新文化运动非常活跃的省份，“一师风潮”是五四运动时期浙江新文化传播承前启后的重大事件。学界重点关注风潮前的思想准备、风潮过程、风潮中的主要人物及其去向，施存统的“非孝”观念被视作风潮前后新旧文化转变的代表^[12]。赵林以先锋与本体之间的冲突分析“木瓜之役”与“浙一师风潮”，认为新型媒介的出现与成长，新话语的形成，城市公共空间功能的嬗变与转型，推动了新知识界主体人格的培养与转变以及新式社团的形成和舆论的制造、传播，促成学生运动逐步升级^[13]。张直心发掘一师文人从事的文学与政治活动间诸种复杂深刻的交会、辩难、互动关系，考察一师文人结社与建党思想的关联性^[14]。叶文心以施存统从金华至杭州再到上海的系列政治活动为线索，分析区域文化冲突、知识分子的文化调适与政治实践之间的互动，展示文化、革命与现代化的复杂关系^[15]。以文化史的视角重新审视革命，回到个人和群体生存的复杂网络，考察行为背后多元且流动的思想认同，或能落实革命史叙事中以人为本的回归。

二、结构与认同

现代化视角聚焦于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社会文化史逐渐成为新显学，以近代中西新旧文化冲突与融合为背景，考察社会结构、文化观念、生活方式、世态民情的变与不变成为研究重点。刘志琴、李长莉等学者运用编年方式勾勒近代世态民情、风俗习尚、社会热点、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的演变，进行史料整理和简要评述，为研究近代社会文化变迁奠定基础^[16]。陈华文认为民国初期以革命的名义改造旧有文化，浙江近代社会民俗文化随着时代发展而巨变，打上深刻的时代和地域文化印迹。“社会的巨大变化引导了民俗的迅速变化，而民俗的迅速变化又印证了社会的巨大变化；两相作用，互相影响，造就了急剧变化的民国早年地方风俗。”^[17]^[152]

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界发生“文化转向”，新文化史研究逐步发展，蔚为大观。结合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关注心态、意识形态、象征、仪式、上层文化及通俗文化，文化史成为语言学理论、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人类学与日常生活批判等理论竞逐的平台。新的研究视角无疑有助于突破既有文化史研究倾向文化表层叙述的局限，拓宽史家视野，以多元的眼光和研究方法审视既有观念与叙述，研究重点从观念或思想转移到心态、预设或情感，挖掘事件背后人们的切实经历和体验状态。萧邦奇以细腻的笔法描绘沈定一在上海、杭州、衙前三种特定空间语境中所处的社会网络，分析革命时期认同的复杂性及其多重身份的冲突，说明因认同而衍生的问题往往左右革命的方向^④。随着研究视域的拓展，浙江近代文化史研究逐步由介绍社会生活、观念习俗的转变，过渡到尝试发掘社会文化现象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结构与心态、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并以此重新认知近代精英与民众、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的能动关系。

³ ① 参见刘训华《清末浙江学生群体与近代中国》上海大学历史系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

② 关于秋瑾案的民间舆论问题，可参看夏晓虹《晚清人眼中的秋瑾之死》，见《晚清社会与文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248页；何扬鸣《近代中国一次成功的新闻舆论：“秋案”研究新视角》，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1期，第24—33页；李细珠《清末民间舆论与官府作为之互动关系——以张曾歇与秋瑾案为例》，《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1—44页

③ 胡纓致力于近代女胜形象等问题。具体到秋瑾的研究，可参看Hu Ying，“Qiu Jin's Inne Burlal : The Maklng of Historical MonumentS and Public Memory，”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19, No . ,1(2007) , pp . 138 — 191 ；胡纓《性别与现代殉身史：作为烈女、烈士或女烈士的秋瑾》。见游鉴明、胡纓、季家珍等主编《重读中国女胜生命故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133页

文化本是历史过程中“结构”与“能动性”的统一体，史学研究应在多元的文化与整体的历史之间建立起有机联系，将文化置于社会、族群与日常生活之中，自觉考虑文化景观与权力、社会结构及其变迁间的互动。周晓虹以近百年尤其是1949年以后江浙农村的变迁以及与之相应的江浙农民精神世界的变化为主题，探求社会结构、大众心理与思想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江浙农民精神世界的变化提供一种社会文本^[18]。潘玮琳以民国时期江浙地区的锡箔业为个案，探讨锡箔的兴起、生产工艺、制造与流通网络，落脚于关注锡箔行业相关具体的人的存在。以此为线索，文章揭示精英话语与民众实践悖反的实态，在言论层面，梳理迷信与反迷信话语，重新看待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宗教和礼俗；在实践层面，探讨政府与知识精英推动的社会改造，以及民间社会的反应；进而思考锡箔业社会经济活动与社会功能、文化意义间的关联性^[24]。冯筱才以20世纪30年代浙江省电影教育运动为中心，研究政策实践与社会民众的关系，探索国民党如何运用电影技术来实现宣传目标，实现自我合法性建构，政客如何将“党国意识”渗人民众大脑，建立民众对“党国”之认同^[19]。

近代新史学兴起之初即提倡眼光向下，以往意识形态浓厚的宏大叙事史中，底层民众难免沦为精英话语或理论的注脚，受到各种新视角的启示，近年学界开始自下而上书写历史，边缘群体、医疗、身体、历史记忆与日常生活成为研究热点。罗衍军根据档案和报刊记载，梳理1927—1937年间杭州报刊书写并建构出娼妓苦难与放荡的双重形象^[20]。周东华以近代杭州的麻风救治为例，探讨福音医学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关联性，审视疾病与社会、文化乃至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关系；他还以“身份建构”与“本色之路”为切入点，考察浙江基督教教育过程中国族建构、身份认同与历史记忆问题；后又以清末杭州广济医院的女性患者及其医疗场景为例，讨论教会医院如何改变清末杭城女性的医疗选择问题，指出医院“自由”的氛围，在“疗身与疗灵”之外，给女性患者及其家属“带来一种或许可以称为‘可替代的现代性’的身体政治”^①。黄东兰聚焦于作为记忆之场的岳飞庙，梳理南宋以来围绕岳飞庙的公共记忆，分析其历史性和多重性，探讨现代国族认同的重要议题^[21]。柯文以跨文化视角描述越王勾践的历史故事在20世纪中国社会的流传与衍化，考察历史记忆塑造过程中的民族和政治指向及其文化寓意与现实功能^②。小田以近代浙江上虞曹娥文化为典型，有机结合社会互动、意识形态的日常版本和地方生活过程，关注精英与百姓的交流、国家与社会的沟通、传统与现代的联结，揭示传统中国民众观念的日常存续机理，说明文化是生活的手段^[22]。

礼俗互动是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自我更新的有效手段，并在近代文化转型过程中形成优良的学术传承，近来学界逐步倾向在多重社会网络中研究民间信仰。顾希佳对江南尤其是浙江地区的民间信仰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主张从田野采风入手，分析浙江民间信仰的历史现状，梳理浙江民间信仰的基本特征，提出移风易俗的实践方针^[23]。朱海滨系统梳理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的历史沿革、神抵信仰的功能、地方神抵与士绅阶层的关系等议题，结合神抵个案和浙江各区域地方神的比较研究，指出宋代以来民间信仰领域的问题可谓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表面上儒家祭祀观念唱主角，实质上是各地传统信仰的延续^[24]。罗士杰力图从地方社会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经验入手，重新诠释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与宗教传统^[25]；他还通过讨论温州金钱会事件，考察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的互动，展示地方宗教传统在温州社会与晚清政局中的功能，进而重新思考宗教在现代中国政治“去中心化”过程中的作用^[26]。张佩国以晚清民初杭州吴山汪王庙的两次重修为线索，梳理汪姓族裔再建构汪华形象的过程，揭示汪姓族裔的表述服从于对汪王庙祭祀权、庙产的考量，官绅、文人的地景想象则凸显汪华的神明地位^[27]。钱杭考察浙江平阳地方神庙薛忠训庙，指出神明祭祀形成固定的祭祀圈和以四大基础姓为核心的祭祀组织，该系统的外在形态以血缘、地缘关系交叉并存为突出特征，生成原则以祭祀事务的责任关系为根据，由此促使该地区在社会秩序变迁过程中得以实现同生共存、互相联系自我调适^[28]。

⁴ ① R.K. Schoppa, *Blood Road: The Mystery Of Shen Dingyi in Revolutiona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此书中译本有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周武彪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 潘玮琳《锡箔的社会文化史：以民国江浙地区为中心》，复旦大学历史系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

城市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重要表征，以往研究强调城市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性。当下城市文化史侧重以城市空间形态为依托，拓展至城市的政治空间、人文空间，从城市文化考察近代中国的多元现代性。蔡禹龙以清代杭城的街区变迁为对象，重点分析街区空间布局的变迁、街区管理与规划、街区的文化记忆与传播、街区市肆与经济变迁^⑤。汪利平指出上海崛起后，江南城市功能与层次重组，杭州由商业中心逐步发展为旅游胜地。近代杭州城市空间的变化揭示了杭州与周边乡村、杭州与上海之间在社会和文化关系上的重大变迁，呈现出一种传统名义下的文化创新现象^[29]。此后，汪利平又详细考察清代杭州驻防旗人在不同时期与当地汉人的关系以及他们对杭州归属感的产生，并试图通过这一个案来思考如何从地方的角度来考察和叙述民族关系与身份认同问题。清末激烈的民族情绪使驻防旗人群体同时面临民族和地方身份认同的危机，并最终被剥夺城市社区成员的资格，成为辛亥革命时期狭隘民族主义的牺牲品^[30]。高崢系统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杭州的政局演化和社会改造，注重政治仪式与文化改造的关系^[31]。高崢进而围绕 20 世纪 50 年代杭州的文化遭遇，考察文化层面上的城市革命和革命背景下的文化磨合，指出文化认同的改变是复杂的双向磨合的过程：南下干部的文化与权力相联系，以行政手段和革命者的人格魅力推广革命文化；杭州年轻人追求革命时尚，显示杭州民众对革命政权与革命文化的认同；茶、越剧和寺庙文化可以融合革命与传统话语，转变自身价值，影响革命干部，展示了城市文化的弹性和张力^[32]。

新旧史料的进一步发掘与解读是史学研究拓展领域、深化问题意识的前提和基础，有效利用近代地方文献极大地促进了理解近代中国宗族乃至基层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周祝伟等以村庄为个案，依托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资料，考察近代以来浙江宗族村落社会的历史变迁、社会形态、宗族文化及其在乡村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等问题，揭示家族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代际的传承、流动与嬗变^[33]。吴松弟及其团队以实地考察的方式，探寻宋明以来浙江泰顺地区历史与地域文化的总体情况，结合实地考察和文献资料，思考政治经济与地域社会、家族文化的建构以及地域文化差异，试图“通过地域考察来再发现中国”^[33]。钟种通过较为系统的资料批判与文献学整理，追溯千年来浙江北江盆地宗族和聚落的变迁历程，探索“近世型宗族”的渊源流变，从文化史层面重新思考近世宗族形成运动^[35]。近年陆续发现并整理出版的黄岩诉讼档案、石仓文书、龙泉司法档案，更为探索近代浙江区域社会文化提供了坚实、系统的文献基础。章毅以石仓《定光古佛寿诞会簿》为中心，探讨清代以来浙南民间组织定光会运作过程中宗教平等性、家族血缘性与经济功能之间的关联^①。杜正贞梳理晚清民国龙泉祭田轮值的纠纷和诉讼，展现普遍存在的民间行为、习惯与法律、宗法制度之间的分合，揭示民国法律代替传统礼制，以新的制度和语言重新整合宗族和族产，与民间社会对礼、法的自由阐释和实质上的突破相配合，加速了社会结构和观念层面上不可逆转的变化；又以龙泉司法档案供词、笔录为中心，考察形式上男女平等的法律体系在基层实践过程中的变化，女性在法庭上仍可能处于另一种强势话语下，无法表达和坚持自身诉求。吴铮强等以司法文书形制、格式、审判机制与诉讼程序的演化为基础，深入考察司法文化所

^⑤ ① 相关系列研究成果，可参见周东华《公共领域中的慈善、福音与民族主义——以近代杭州麻风病救治为例》，载《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3期，第114—134页；《去医院就洋医：清末杭州广济医院的女患者及其医疗场景》，载《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4期，第128—139页；《民国浙江基督教教育研究一以“身份建构”与“本色之路”为视角》，（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② P. A. Cohen, *Speaking to History: The Story of King Goujian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相关书评可参见邓京力《历史知识、历史记忆与民族创伤》，载《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第139—143页。

③ 蔡禹龙《清代杭州的城市街区与社会变迁》，浙江大学历史学系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

呈现的权力关系、社会结构、文化观念等问题^⑥。中国区域性的地缘文化自古较强，区域文化对大众的观念、行为皆有直接、间接的影响。有机结合传统文献、民间文献与田野调查，探索近代浙江社会文化的内在脉络与独特历史经验，应是推进中国研究视角多元化的有益尝试。

三、学人与学派

宋代以降，浙江成为举足轻重的文化大省。朱海滨运用文化地理学的视角，从学术、风俗、方言和戏剧等文化要素切入，考察宋元明清时期浙江文化的区域特征与差异，挖掘其深层次的形成机制^[36]。浙江学术传统自然成为近代学术传承、文化转型的重要资源。清末浙籍留学生高举复兴浙学的大旗，“以与世界之文明相激相射相交换相融和，放一重五光十色之异彩，以灌溉我二十一行省之同胞。浙江者，文明之中心点也”^[37]。《浙江潮》锐意进取，以有限的文本创造较大的影响，倡导思想文化意识启蒙，被誉为浙江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有力推手之一^[38]。黄健提出“两浙”文化原型的构成要素具有博纳兼容、经世致用、刚柔并济、开拓创新和诗性品格的特点。近代“两浙”文化成为建构开放理念空间的有效平台，融合了耻为人后的忧患意识、心理认知方式与开拓进取精神，以此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39]。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文学革命为先声，鲁迅、周作人、茅盾、夏衍、徐志摩、戴望舒、丰子恺等浙籍作家从“树立人的坐标”、“引领文学价值”、“文学形式的革新”等方面有力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浙江新文学作家群的生成被视为地域性启蒙文化传统的现代延续，以“浙东学派”为代表的两浙文化传统对中国新文学“浙军”产生深层影响，昭示转化固有文化传统之于现代性进程的重要意义^①。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在中国固有学术思想由内部转化迈向移植西学的转型时期，浙江学人做出了不同方式的尝试。廖梅历时性地梳理了汪康年的思想脉络与言说语境，深入分析汪康年革新中国的理想和具体方案的前后曲折，鲜活地展示了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的变化轨迹^[40]。孙青以孙宝焯《忘山庐日记》为例，力图从接受层面厘清晚清读书人援引传统又突破原有知识框架，建构“西政”图景的历程^[41]。蒋海怒通过《忘山庐日记》考察戊戌前后知识人佛学兴趣的高涨、政治文化思潮与佛教思想的交涉、儒学内在调整过程中的儒佛关系^[42]。潘光哲力图回到历史现场，精细分疏朱一新的读书世界，指出阅读经历为朱一新的地理学知识生产活动提供了思想动力^[43]。放梅舫剖析朱一新恢复不分汉宋的治学路向，以实证虚，回到其论学语境，接近其论学旨趣与本意，展现朱一新对浙粤学术的认同或疏离，进而指出浙粤学人汉宋见解的同异及处理汉宋办法的高下，寻求学术正途^[44]。徐佳贵以孙治让研究《周礼》的学术历程为线索，考察西力东侵之际经典考据和经世思潮内在指向的变迁^[45]。汪林茂以定性研究与量化统计相结合的方法，通盘分析晚清浙江传统学术逐渐衰微和嬗变的过程，进一步理清中国学术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历史脉络^[46]。知识与制度的转型无不影响到新旧士子的文化认同和现实抉择，近代温州地区多样的稿本文献成为解释此问题的绝佳素材，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李世众在厘清晚清温州士绅与地方政治格局的基础上，以《厚庄日记》手稿本为中心，考察平阳士绅刘绍宽积累文化资本以编织关系网络，由此获得社会权力的历程，展示新旧文化资本在趋新士人身上形成紧张关系^[47]。徐佳贵通过解读温州士子林骏的《颇宜茨室日记》，探索近代废科举、兴学堂过程中，某些

^① 参见章毅《祀神与借贷：清代浙南定光会研究——以石仓（定光古佛寿诞会簿）为中心》，载《史林》2011年第6期，第66-77页。目前有关石仓文书的研究成果多侧重于社会经济领域，暂不详述。

^② 浙江大学地方历史文书编纂与研究中心近年来致力于整理出版与研究龙泉司法档案，与本文相关的研究成果有杜正贞《晚清民国时期的祭田轮值纠纷——从浙江龙泉司法档案看亲属继承制度的演变》，载《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第79-91页；杜正贞《晚清民国庭审中的女性——以龙泉司法档案供词、笔录为中心的研究》，载《文史哲》2014年第3期，第79-93页；吴铮强、杜正贞、张凯《龙泉司法档案晚清诉状格式研究》，载《文史》2011年第4辑，第185-214页；吴铮强《龙泉司法档案所见晚清屡票不案现象研究》，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34-41页；杜正贞《民国时期的族规与国法——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季氏修谱案研究》，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21-33页；胡铭、张健《转型与承续：民国时期的刑事和解——基于龙泉司法档案（1929/194助的考察》，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5-20页。

地方士子看似前后抵牾的行为背后一以贯之的文化策略^[48]。在近代思想文化变迁的现实场景中，考察近代浙江学人组织和参与的政学组织与机构，澄清学人学术思想的本意和实践，既可彰显浙江学人在近代学术流变中承前启后的作用，又能展示价值体系、思想观念与现实生活的张力，这些均成为近代浙学重建的重要资源。

20 世纪初，学界依傍西学的分科概念反省中学，讨论中国是否“有学”。陈黻宸及其弟子认为中国古已“有学”，只需复兴古学，保存国粹，贯通中西，即可创新史学。陈黻宸的民史观被视作近代新史学思潮的重要一环^[49]。侯俊丹回到地方史和地域学术传统，考察近代江南社会结构、机制的转变与永嘉学派的再兴，指出陈黻宸民史观的形成与 19 世纪中叶以来浙江文人群体的经世传统密不可分，同时吸收西方实证主义史学和经验论传统，融合永嘉经制学、陆王心学和章学诚史学，重新解

释经学典范价值，以民史为核心建立系统的总体社会科学学说^[49]。随着近代新学制的建立，学术分科化，以经学为主导的传统学术格局最终解体。章太炎是近代经史过渡与国学研究转型的核心人物，太炎门生聚集的北大国学门提倡整理国故，使国学研究成为时尚。卢毅将章门弟子作为一个群体，从宏观层面加以集中考察，着重结合中国近代中西文化观演进、近代文学擅变、伦理思想变迁、语言文字改革、近代学术转型等议题，对章门弟子进行系统研究，全面揭示他们对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杰出贡献，彰显其历史地位^[50]。与此同时，学衡派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实现科学人文化。1936 年，竺可桢执掌浙江大学后，浙江大学成为学衡派又一学术重镇。竺可桢的学术、办学理念与东南大学、学衡派一脉相承，改革教育理念，发展文史学科，平衡文史冲突，融贯新旧，沟通文质，为通才教育作先导，为现代民治奠定基础^①。民国老辈学人在以新文化理念书写的民国学术史被长期有意遗忘，而依循先辈理解旧籍的路径，或是回到历史现场去认识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门径。章太炎晚年讲学，以历史文化与国族精神整合今古和经史之学，确立华夏文明的主体性，守先待后^[51]。马一浮学术三变，归宗程朱，融通陆王和佛教，建构理气心物融合的“六艺一心论”，从心性本原缓解中西文化的紧张与对立。陈锐认为马一浮六艺之教的阐释，其意义不仅在于宗教与哲学的思考，其历史和文献的考虑也非常重要，抽象的道体现在具体的“文”或文献之中。从国学演讲到创办复性书院，既反映近代儒学的转变，又可视作新时代为儒学寻求新制度依托以及教育实践的样本^[52]。钱明认为，蔡元培倡导的“自由精神”和竺可桢所倡导的“求是精神”均与阳明精神一脉相承。马一浮亦铸成较为独特的阳明学观，

⁷ ① 关于近代浙江文学家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此仅为群体性概述。可参考王嘉良《论浙江新文学作家群对两浙文化传统的承传》，载《浙江社会科学》2004 年第 5 期，第 191—196 页；《地域人文传统与浙江新文学作家群的建构》，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 年第 4 期，第 187—203 页

② 关于陈黻宸及其门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可参见：林辉锋《从史学到文字学：马叙伦早年学术兴趣转变的内在思路》，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5 期，第 52—57 页；张帆《“有学”“无学”之辨：20 世纪初“科学”标准下的中学自省》，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4 期第 72—84 页。

⁸ ① 关于浙江大学学术转型的代表性成果，参见何方显《知识、权力与学科的合分——以浙大史地学系为中心（1936—1949）》，《学术月刊》2012 年三期，第 115—154 页；何方里《科学与人文的融通之路——以〈思想与时代〉月刊同人的科学言说为中心》，载《学术月刊》2007 年第 10 期，第 147—155 页；张凯《沟通文质：国难之际浙江大学学术转型》，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1 期，第 88—97 页。

② 关于马一浮学术思想的研究，可参见许宁《六艺圆融：马一浮文化哲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 8 月版；陈锐《马一浮的“六艺之教”在文献学上的意义》，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5 期，第 11—18 页。

王心湛创办阳明学社、创刊《阳明学》的重要举措为现代阳明学发展史提供有力注脚。民国年间绍兴知识群对阳明学的转化和发扬可视为浙学在现代的重现与复兴仁^[52]。

从清末“兴浙学会”至民国“浙东学术”之提倡，再到重修浙江通志，以复兴“浙学”和“浙东学术”为名，沟通中西新旧，实现政教转型，是浙江学人重建中国学术体系的有益尝试。晚近学界往往以后人观念界定学术流派，或以行政、地理区划代指学术流别，浙学也不例外。泛化的学派观念固然有利于发掘乡土文化资源，却无助于区分学术内部的不同流派。诚如钱茂伟指出的，“浙学”、“浙东学术”是一种学脉建构活动，学脉就是建构起来的历史图像之一。谱系建构是记忆的重新组合，组合的标准与方式是由建构者当下的语境和目的所决定的^[53]。浙东学派最初指称明代阳明学的传承体系。章学诚晚年为追认自己的学术而进一步构建浙东学术谱系。《浙东学术》篇提出，浙东学术以陆王为根底，同时兼备朱子与陆王之长，随后构建浙东学术的学统：三袁、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万氏兄弟、全祖望、章学诚。维新运动时期，浙籍学人整合浙东与浙西之学，成立浙学会，与康有为倡言孔子改制说争锋。浙东学术“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特质使浙东学术成为近代经史转型的重要媒介。周积明、雷平指出，浙东学派经过了章学诚、章太炎和梁启超等人的不断构建，每次构建无不融入入了构建者的情感、意志和价值取向，因而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学术谱系序列^[54]。杨际开从东亚文明离合的层面，以宋恕政治思想的源流为线索，重新审视清末变法和日本的关联，重估浙学在清末民初变法与革命、政治实践与思想变迁中的转承意义，旨在为重建东亚道德共同体提供参考^[55]。张凯指出，蒙文通、刘咸忻等学人重塑“浙东史学”旨在寻求传统学术的近代出路^[56]，进而尝试以疏源浚流的方式系统考察晚近学人转化浙东学术的本意与主旨，或将进一步探明近代学术流变，对当下构建中国学术本位有所贡献^[59]。中国学问强调义理与时势相会通，每家学说和流派的兴起、成立、传承均源自学术传统与特定时代的激荡。超越晚近学人沟通古今中西时考据与义理、方法与立场的分合，当是探寻学术正途的有效途径，浙东学术和浙东学派的研究无疑是其中不可忽视的环节。

四、展望

近代江南史研究见证且参与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相较于上海、苏南等地区，浙江近代文化史亟须进一步拓展与深化。警惕隐藏于“学术正确”背后的狭隘的“局内人信条”，以开放、包容、诚恳的态度，妥善结合文化史研究的多元范式与中国问题，必将推进浙江近代文化史研究。同时，追本溯源，回到民国初年文化史研究的起点，文化史的写法与功能就有多种分歧。趋新学人将文化史视为现代学术分科体系的有机构成，胡适主张以客观的科学方法重建中国文化；梁启超提出要科学与直觉方法并举，以内省和躬行的方法研究德性之学。老辈学人倾向以文化史整合传统义理之学和经史之学，宋育仁强调“述文化于史”，文化史应贯彻六经所承载的人伦政教与大义微言。现代科学学术体系的建立实为不得不然的时代趋势，价值立场的调适、转化必须有现代学术方式的论证和表达来配合。不过，若以单一的现代学术分科去理解、判断中华文明，则难以超越古今中西二元对立，甚至难免会落入套用西方理论裁定中国历史走向的窠臼。如何在德性之学与政教体系、社会秩序之间建构能动关联，既是宋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又是近代古今中西之争背后的根源性问题，近代文化变迁因此衍生。

现有学术研究体制常在分科与专门研究之后再走向跨学科与通史书写，其结果往往是强化分科，割裂根源问题的整体性。如若以中国历史发展主题为思考的起点，回归人本，在宋元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中，运用多元视角理解近代中国丰富的历史经验，以知常明变的方式动态地寻求中国原理，或能使学术研究回归根源性问题，在历史、当下与未来之间建立有机联系。具体到近代浙江文化史研究而言，应以整体眼光贯通学理、结构、事件。道不可空谈，中国原理和价值应来自日用而不知的生活实践，即事而求理。事件是个体与群体行为的起点，“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从波澜壮阔处把握住历史的大转折，不断以多元的视角和时代感去解读与阐释革命事件及其内在机理，自能深入理解近代文化观念的表达和实践。社会结构与民众心

⁹ ① 关于晚清民国浙东学派建构与近代学术转型相关初步研究，还可参见张凯《“浙东学派”与民国新史学：以何炳松“浙东学派”论为中心》，浙江省社会科学界第二届学术年会人文学科专场发言，2014年11月29日；张凯《通史经世：清末民初“永嘉学派”与“浙东学派”之叙述》，香港浸会大学“明清史：史料与课题”学术研讨会发言，2015年1月10日。

态、制度架构与文化认同交织而成的生活空间、社会网络无疑是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基础与情境。学人和学派意味着文化传承与价值担当，往往能积极应对与反思时代和社会变迁，并为之提供价值立场与方向指引。从事件、结构、学理的整体视角考察近代浙江文化内在脉络，同时有效拓展史料与理论范式，会通古今中西，将为探索中国原理提供有效的知识和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 [1] 朱维铮：《中国文化史的过去和现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5期，第60—67页。
- [2] 余君：《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区域文化史专著—〈浙江文化史〉评介综述》，《浙江学刊》1993年第2期，第122—123页。
- [3] 滕复、徐吉军、徐建春等编著：《浙江文化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 [4] 沈善洪主编：《浙江文化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
- [5] 邱巍：《六十年来辛亥革命研究之学术变迁—以研究假设和研究取径为中心》，《学术月刊》2011年第10期，第144—154页。
- [6] 何扬鸣：《浙江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第92—101页。
- [7] 桑兵：《先锋与本体的冲突——壬寅浔溪公学第二次风潮述论》，《中华文史论丛》2001年第3期，第131—161页。
- [8] 吕顺长：《清末浙江与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 [9] 吕顺长：《清末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之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 [10] 李细珠：《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的历史建构》，《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5期，第147—152页。
- [11] 王楠：《魂归何处？围绕秋瑾的记忆博弈》，见孙江主编：《新史学》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1—59页。
- [12] 姚辉、宋健：《五四新文化在浙江的传播》，《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第25—28页。
- [13] 赵林：《辛亥前后杭州新知识界与学生运动—以“木瓜之役”和“浙一师风潮”为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103—113页。
- [14] 张直心：《结社与建党—民初浙江第一师范人文学与政治活动考论》，《文学评论》2013年第3期，第43—49页。
- [15] W. Yeh, *Provincial Passages: Culture, Space,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
- [16] 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年。
- [17] 陈华文：《民国初期的社会变革与民俗文化改造—以浙江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07 年第 6 期，第 147 - 152 页。
- [18]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
- [19] 冯筱才：《形塑党国：1930 年代浙江省电影教育运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5 期，第 80 - 92 页。
- [20] 罗衍军：《民国时期的娼妓书写与治理—以杭州（1927 - 1937）为中心》。《浙江社会科学》2008 年第 5 期，第 98 - 102 页。
- [21] 黄东兰：《岳飞庙：创造公共记忆的“场”》。见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158 - 177 页。
- [22] 小田：《论民众观念的日常存续——基于近代“曹娥文化”的扩展分析》，《历史研究》2013 年第 4 期，第 63 - 79 页。
- [23] 顾希佳：《浙江民间信仰现状当议》，《浙江社会科学》1999 年第 5 期，第 65 - 69 页。
- [24] 朱海滨：《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年。
- [25] R. S. C. Lo, “Local Politics and the Canonization of a God : Lord Yang (Yang Fujun) in Late Qing Wenzhou (1840 - 1867) , ” Late Imperial China , vol . 33 , No . 1 (2012) , pp . 89 - 121 .
- [26] 罗士杰：《地方宗教传统与“去中心化”的地方政治：重探温州金钱会事件（1850 - 186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2 年第 75 期，第 159 - 202 页。
- [27] 张佩国：《正统化、祭祀权与庙产之争—清末至民国初年杭州吴山汪王庙的两次重修》，见常建华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 13 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24 - 37 页。
- [28] 钱杭：《忠义传说、祭祀圈与祭祀组织—浙江省平阳县腾蛟镇薛氏忠训庙的历史与现实》，《史林》2002 年第 1 期，第 35 - 42 页。
- [29] L. wang , “Tourism and Spatial Change in Hangzhou , 1911 - 1927 , ” in J. W. Esherick (ed .) , 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 : 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 1900 - 1950 , Honolulu :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1999 , pp . 107 - 120 .
- [30] 汪利平：《杭州旗人和他们的汉人邻居：一个清代城市中民族关系的个案》，《中国社会科学》2007 年第 6 期，第 188 - 200 页。

-
- [31] J. 2. Gao,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 — 1954*,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 [32] 高崢: 《50年代杭州的城市革命和文化磨合》, 见姜进、李德英主编: 《近代中国城市与大众文化》,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8年, 第315—329页。
- [33] 周祝伟、林顺道、陈东升: 《浙江宗族村落社会研究》,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01年。
- [34] 吴松弟、刘杰主编: 《走入中国的传统农村: 浙江泰顺历史文化的国际考察与研究》, 济南: 齐鲁书社, 2009年。
- [35] 钟翀: 《北江盆地——宗族、聚落的形态与发生史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年。
- [36] 朱海滨: 《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年。
- [37] 公猛: 《浙江文明之概观》, 《浙江潮》1902年第1期, 第18页。
- [38] 龙长征、钱诚一: 《近代报刊与浙江现代化进程—以〈浙江潮〉为例》, 《浙江学刊》2010年第5期, 第222—224页。
- [39] 黄健: 《“两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第26—30页。
- [40] 廖梅: 《汪康年: 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
- [41] 孙青: 《晚清之“西政”东渐及本土回应》,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年。
- [42] 蒋海怒: 《佛学与戊戌前后知识人精神世界的重构—以〈忘山庐日记〉为个案的分析》,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第105—113页。
- [43] 潘光哲: 《朱一新的读书世界与“地理想象”的知识基础》, 见《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1833—1898)》,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14年, 第121—161页。
- [44] 於梅舫: 《浙粤学人与汉宋兼采—朱一新〈无邪堂答问〉论学旨趣解析》, 《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 第4—15页。
- [45] 徐佳贵: 《经典考据与晚清“经世”思潮: 以孙治让及其〈周礼〉研治“经历”为中心》, 《“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14年第41期, 第105—149页。
- [46] 汪林茂: 《从传统到近代: 晚清浙江学术的转型》,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年。
- [47] 李世众: 《晚清趋新士人刘绍宽的文化资本、关系网络与社会权力》, 《历史教学问题》2013年第6期, 第22—28页。

[48] 徐佳贵：《废科举、兴学堂与晚清地方士子——以林骏〈颇宜茨室日记〉为例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4期，第110—125页

[49] 侯俊丹：《新史学与中国早期社会理论的形成——以陈黻宸的“民史”观为例》，《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4期，第152—176页。

[50] 卢毅：《章门弟子与近代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51] 桑兵：《民国学界的老辈》，《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第3—24页。

[52] 钱明：《“浙学”的现代呈现：以绍兴知识群的阳明情结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第122—128页。

[53] 钱茂伟：《论浙学、浙东学术、浙东史学、浙东学派的概念擅变》，《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11期，第87—93页

[54] 周积明、雷平：《清代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的构建》，《学术月刊》2004年第6期，第40—46页。

[55] 杨际开：《清末变法与日本——以宋恕政治思想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56] 带凯：《浙东中学与民国多中转型：以刘咸忻、蒙文通为中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157—168页。